

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研究(1840-1937)

王 芳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无论在演变趋势、奉祀主神,还是在信众分布、信仰取向上,都反映出其整体性衰落的共同特征。这一衰落性特征,不仅减缓了近代山东传统型庙会的发展,而且削弱了近代山东整个神灵信仰文化之公共信仰的根基。这也是山东庙会近代化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庙会;神灵信仰;迷信;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89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16(2009)01-0010-05

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既是近代山东庙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神灵信仰文化的有机构成。因此,考察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的发展,不仅反映出近代山东庙会文化的历史变迁,而且渗透着山东神灵文化的近代嬗变。笔者借助山东地方志等主要资料,以期通过研究来体现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一、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的演变趋势

神灵信仰是人类最古老的意识形态之一。就中国的神灵信仰而言,其众多的神灵和复杂的神性,在世界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神灵信仰的发展体现出阶段性规律:原始社会是神灵信仰的形成时期,其后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不断发展,尤其明清时期更是中国神灵信仰的整合与定型期。但步入近代以后,中国人对神灵的信仰则有所淡化。

近代山东庙会的神灵信仰同样遵循上述规律,呈现出淡化趋势。这可以从近代山东坛庙的兴废上得到佐证。

根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的统计,在山东各地的201处坛庙中,建于1860年以前的有137处,建于1860年至1916年间的有2处,建于1916年以后者无,建造时间不详者62处;重修于1860年以前者59处,修于1860年至1916年间的23处,修于1916年以后的12处,重修年代不详者9处;废圯于1860年以前者2处,废于1860年至1916年间者1

处,废于1916年以后者40处,废圯不详者3处。^{[1](736-737)}从这一数字的分布情况来看,若以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大致年代1860年为界线,这之前是山东神灵信仰的兴盛期,之后则为衰落期。近代以后,山东的各种坛庙大多废除祭祀,有些改为它用,有些虽继续存在,但已无典祀。

坛庙作为民众公共的宗教活动场所之一,其不断减少甚至消失的历史现象,并不意味着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神灵信仰也随之荡然无存。但是,近代山东坛庙所遭受的凄凉命运毕竟动摇了神灵信仰所依托的空间之根基,因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以来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逐步走向衰落的概况。

笔者认为,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逐步走向衰落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历届政府破除迷信的政策和革命运动,使得近代庙会之神灵信仰难有正大光明的前途而逐步衰落。

20世纪初,清末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实施了庙产兴学政策,利用尼庵、道观和寺院地产及租息以兴学。在此期间,山东有很多寺庙的神像被推翻以改作新式学堂。这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民间迷信聚众活动的范围,减少了民众在庙会场合敬奉神灵的机会。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重视破除社会陋俗尤其是迷信对建设共和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南北统一,国势大定,将欲修明内治必先革除社会陋习”^[2]。至国民革命时期,又是破除迷信精神高涨的年代。其中,破除神灵迷信首

收稿日期:2008-11-04

作者简介:王芳(1983—),女,山东泰安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当其冲,全省各县、乡乃至村,都掀起了一股股的“毁神”热潮。济宁王母阁庙会的近代历史遭遇即颇具代表性。民国成立前,除城市的城隍庙、元齐庙会外,其“为济宁城市间的第一香火大会”,“自民国成立在庙内设一农桑学堂,经学界将神攀在水中,其会渐小。至民国七年春,……其会遂废。自民国 17 年革命成功,被教育局拆平。至如今(民国 22 年,作者注)经其地者,但见满眼荒凉……”^{[3](231)}由此可见,在祛除神灵迷信中革命风暴的巨大威力,这威力迫使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渐趋淡化。

第二,天灾人祸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近代山东庙会的稳定发展,从而缩减了民众之庙会神灵信仰的公共活动空间。1840 年至 1937 年,正是兵连祸结,战乱不已的时代:有军阀之间的混战,有国民党中央政权同地方势力的争夺,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此外,“自民元以来,山东就是全国土匪最多的省份之一”^{[4](100)},已匪满为患。以上种种“人祸”再加之近代灾荒,致使民众遭受着多重打击,生活多已困苦不堪。因此,底层民众无心也无力举办庙会,随之庙会祠神备受冷落。

第三,民智渐开使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的内驱力渐趋弱化。近代山东在经历了革命运动的冲击和政府的竭力宣传后,民智确已大开,对于“拜偶像”之类的神灵信仰,“稍有智识者不肯也”^{[5](192-193)}。即使是底层民众,烧香拜佛的人也减少了。

第四,近代山东庙会的现代化发展逐渐削弱了其神灵信仰的主导地位,这正是山东庙会近代化的必然结果。这不仅促使其进一步去封建迷信的成分,而且利于壮大具有发展活力的部分,因而山东庙会原有多元功能的互动关系经不断调整后逐渐发生演变;神灵信仰的主导作用发生根本动摇,商贸与文娱功能日益彰显魅力。

我们也应看到,近代山东神灵信仰的淡化还是有限的、曲折的。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神灵崇拜都被禁止,神灵信仰的淡化仅限于较正规和影响较大的神灵,并未涵盖全部。其次,虽然近代以来,山东坛庙多年久失修,毁坏严重,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重修的,也不是全部毁灭或改为它用,还是有不少坛庙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尚存。这一方面说明山东坛庙在近代尚有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表明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依然有生根之地。再者,神灵信仰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心理问题,要想实现从有神论到无神论的彻底变革并非一蹴而成,这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纵然坛庙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拆毁,正规的宗教活动可

以在风头上收敛一时,但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宗教信仰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强行驱除。因而,当近代山东庙会的正规神灵信仰衰落以后,其大多流为迷信,广泛地存在于民间社会。

二、近代山东庙会之奉祀主神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于 1933 年 8 月出版了《山东庙会调查集》,其收录有山东 26 县的 46 篇庙会文章。这些文章所叙述的有关庙会供奉的主神以下面几种遇见的次数最多:

近代山东庙会奉祀主神之简表^①

供奉的神灵	记载的次数
龙王	5
佛爷	5
药王	4
菩萨	4
泰山奶奶	4
送子娘娘	3

由于《山东庙会调查集》所涉及的 26 县散布于全省四方,因此以上的统计资料有一定的代表性。下面,笔者对近代山东庙会奉祀的主要神灵作一简要分析:

(一)龙王:是水神系统的神灵,原为古人幻想出来的动物神,被视为象征吉祥的四灵(龙、凤、麟、龟)之首。中国作为农业国家,对水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大的。龙所具有的行云施雨的灵性恰好满足人们对水的需求,因而民众对其产生了无限的崇拜和敬畏之情。尤其到唐宋以后,统治者不断加封龙神为王,使得龙神信仰迅速普及。龙神也逐渐由原来的动物神变为农神,在全国上下形成了“龙王庙林立”的局面。至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曾下令废除各地对自然神的官方祀典,把风、雨、雷、电、龙王、山、川等各类自然神的祠庙改为学校、工厂等机构,并在全社会提倡科学,破除迷信。但官方的一纸禁令没有也不可能使广大民众一夜之间从骨子里忘记自然神,不再有自然神灵信仰。事实上,以龙王为代表的自然神信仰在近代山东民间依然广泛存在。如栖霞县龙王庙庙会虽然没有龙王神像,但仍有许多民众来行跪拜四叩礼。^{[3](245)}

(二)药王:是古代人们对精于医术的名医和有关传说人物加以崇拜和神化后而被奉为主司医药的神灵。由于古代百姓生活困窘,生命没有可靠的保障,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纷纷寄希望于能医治百病的药王,祈求药王能赐以灵丹妙药来保平安健康。因此,药王以其独特的职能受到民众的普遍信仰。

相传药王孙思邈生于农历四月二十八,所以,近代山东各地仍旧值此药王诞辰日举行庙会。博兴药王庙会从农历四月二十八起至五月初止,“集会6天或8天,必要时亦往往延期”^{[3](201)};济南药王庙会从药王神诞日开始,会期十至十五天。会期之所以较长,并不是主要用来祭祀药王,而多是用来进行药材交易。由此可见,山东药王庙会的神灵信仰功能在近代已大为减弱。

(三)碧霞元君:是道教崇奉的女神之一,被尊称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或称“泰山女神”、“泰山玉女”,民间大多亲切的称为“泰山奶奶”。传说她能为众生造福,祛病免灾,求子得财。

泰山女神信仰历史悠久,直到宋真宗封禅泰山后,碧霞元君才超越东岳大帝成为泰山主宰,受到全国各地的虔诚供奉,可谓灵应九州。近代以来,尽管官方政府规定五岳的山神信仰被列入废止之列,但碧霞元君信仰已融入民众的生活中,难以即刻消除。因此,每值诞辰日^②,近代山东有些地方的善男信女仍云集碧霞元君庙进香朝拜,并举行盛大的庙会娱乐活动以示庆祝:如青城县城西关娘娘庙(碧霞元君祠)会,商贾云集,香火甚盛^{[5](181)};济宁的鲁桥会是以泰山奶奶起的会,庙会上“来往不下数万人,会上亦不断地演戏,此外更有把戏、洋片、卖拳、说书等玩艺”^{[3](233)}。

(四)城隍神:是古代城池的守护神。唐宋时期,城隍神的职司广泛,不仅守卫城池、保境安民,而且主管当地水旱吉凶和阴间事务,逐渐由自然神转变为社会神。到明朝以后,城隍神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进入民国后,政府虽不断强调当时已是“科学昌明时代,城隍实无存在之必要”^{[6](503)},倡导民众舍弃城隍神信仰。政府的努力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效果,如聊城冠县于1929年销毁城隍神像,传统城隍出巡的民俗被废除;潍县“五月一日,俗为城隍神出巡之期。民国后,此举已废”^{[7](209)}。但政府的政策力量实难渗入到民间底层社会,因此,城隍神信仰依然存在于乡村民众间。如朝城四月十五城隍神生日时,民众设杂剧为醮事庆祝:“远近纠会,具猪羊、食品上供,四乡祝者男女拥杂,或更用彩纸帛北(扎)为舆辇、宫室,前以彩杖、鼓吹引道,男女随后作佛号”^{[5](327)}。诸如此种祭祀城隍的民俗,山东近代地方志中多有记载。

近代山东庙会普遍信奉的主要神灵当然不止上述这些,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上述四个代表性神灵来说明以下问题:其一,他们都属于庇护神,用以扬善惩恶,应人之求,给

人以精神安慰和心灵归宿。其二,一些神灵在近代依然有信众,仍旧受祭祀,这表明其信仰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并未完全衰亡。

三、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的信众分布

神灵信仰作为民俗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具有一般民俗的共性,即“社会性、传承性、民族性、地域性、变异性”^{[8](9)}等。单就地域性而言,近代以前山东信众分布很有地域特色:鲁西信众以运河水神信仰为主,鲁中信众以山神崇拜为最,胶东信众则主要信奉海神。近代以后,这种地域特色发生了诸多改变。

(一)鲁西地区

鲁西地区是山东的运河区域,这一带的民间信仰在明朝以前是比较单一的,除了儒、道、佛及官府提倡的城隍、土地诸神之外,较为突出的就是对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的信仰。进入明朝,这种状况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和人们对运河的倚重而发生了明显变化,民间信仰日益多元化,其中对运河水神—金龙四大王的信仰成为鲁西运河区域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

金龙四大王信仰源于对南宋人谢绪的神化,因而这是一种对人神的崇拜。金龙四大王从产生时就兼具黄河之神和运河之神的双重神格,明代永乐以后,随着京师的北迁和漕粮运输的日益重要,金龙四大王漕运之神的特征就更加突显。官方崇祀金龙四大王,使之位列国家正祀,完全是基于保障漕运、维系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民间顶礼膜拜金龙四大王,推崇它为“北方河道尊神”,则不仅是保佑舟船漕运之安,更多的是加进民众内心企盼平安富足的渴望。因此,金龙四大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产生的一种新的民间信仰,凭借漕运河道保护神的独特作用,其在明清时期的官府和民间中“成为一种十分突出的共同信仰”^{[9](270)}。

到晚清咸丰朝时,黄河曾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后的黄河在张秋附近穿过运河,这破坏了明清以来会通河的水源体系,极大降低了运河的通航能力。进入民国后,正值社会动荡、救亡图存之际,对运河的彻底疏通治理自然无从谈起。虽然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曾对山东运河进行过局部的修治,但山东运河始终没有全线贯通,凋敝残存的局面并未改变。鲁西民众对运河失去了往昔的依赖,与此相适应,对运河水神的信仰也逐渐淡化。但是由于习俗的惯例,鲁西少数地方仍保留对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如临清卫河南水门内还有一坐建于清初的“龙王庙”,“祀宋人谢绪

封金龙四大王”^{[10](120)}。

(二)鲁中地区

山神的形成基于人们对大山的崇拜。就山东中部地区来说,山地广袤,山神崇拜尤为突出,“一般的山上都有个小山神庙”,并且“每年都要祭祀一次”^{[11](349-350)}。

鲁中山神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东岳大帝泰山神和碧霞元君。东岳大帝为首任泰山神,他是历代帝王封禅泰山的直接产物,从秦汉至明清千年不衰。宋真宗以后,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地位日益提高,加之明初朱元璋除去东岳大帝的一切封号,使其地位相对下降,碧霞元君则取而代之成为泰山主宰。近代之前,东岳大帝信仰始终属于国家祀典,只有帝王才有资格祭祀,因而其信仰范围相对较小;碧霞元君的政治性较弱,无论帝王还是百姓,都把碧霞元君当做自己的保护神加以朝拜祭祀,因而其多元化和平民化的特性为碧霞元君信仰构筑起广泛的社会基础。近代以来,国家祀典随着封建制的灭亡而结束。至民国1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明确规定“五岳四渎,均在废止之列”^{[6](502)}。作为五岳之首“泰山”的主要神灵—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其官方信仰均被废止,但民间信仰的潜流仍暗暗涌动。

(三)胶东地区

海神亦称天后,胶东沿海多称“海神娘娘”以示亲昵。她是沿海渔民的保护神,是沿海民间最为崇拜的神祇。由于胶东地区濒临渤海和黄海,浩瀚无边的海洋使沿海居民对其产生了一种神秘莫测之感。海洋在给人们带来无穷财富的同时,也常常无情地吞噬他们的生命,这种变化无常已超出人们的掌控,因而只能求助于海神娘娘,祈求她保护渔民顺利出海,平安返航。正是通过祭祀海神娘娘,渔民们才能缓解畏惧心理,求得心灵上的慰藉,从而增强海上生存的勇气和信心。所以,海神娘娘信仰在沿海民间甚为盛行。近代尤其民国年间,海神娘娘亦被政府列入“淫祠类”,禁止祭祀,但事实上民众多阳奉阴违。近代青岛及烟台的天后宫,供奉海神妈祖最为有名,“每年七月初一到初七,是妇女祭拜海神的日子,上庙烧香者络绎不绝。”^{[12](2167)}

四、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取向

山东庙会神灵信仰是一个庞杂的文化体系,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其信仰取向具有时代性。就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取向而言,既有对古代的继承,又有近代的变化。

首先,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依旧趋于多样性和功利性。

一般说来,神灵信仰产生及其历史延续的主要动力源于民众内在的精神需求。因此,只要这种需求存在,民众的神灵信仰便一时不易改变。尤其是触及民众内在心态的多样性和功利性这两大信仰取向,则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跨时空性。据学者考察,山东近代庙会奉祀的神主仍有30余位,并且种类多样:既有庇护神、赐福神,也有佛教、道教等宗教神,还有将英雄、贤达等加以神化的神灵。^{[13](78-83)}而山东荣成的俗语:“有用的时候是王三爷,不用的时候是瞎王三”,则凝练了近代山东民众对庙会神灵信仰所持有的功利性心态。

再者,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破坏了原有的官方正统性和等级性,集中体现为民间世俗性。

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山东又是儒家文化的诞生地,因此,山东神灵信仰无疑具有较强的正统性,其普遍信仰的神灵大都被列入国家祀典。步入近代后,部分国家祭祀随着封建政权的消亡而结束,一些原来官方信仰的神灵已失去官方认可的资格,因而原有神灵信仰的官方正统性和等级性也就随之瓦解。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的民间性、世俗性进一步增强,有关神灵信仰的民俗活动得以传承。

最后,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呈衰落性。如前所述,在近代山东庙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神灵信仰的主导作用已发生根本性动摇,商贸和文娱功能则日益增强。这符合近代山东庙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

五、结语

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既是近代山东庙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神灵信仰文化的有机构成。因此,考察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的发展,不仅反映出近代山东庙会文化的历史变迁,而且渗透着山东神灵文化的近代嬗变。

首先,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在庙会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庙会的性质及历史命运。近代以前,山东庙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神灵信仰为主导功能的庙会,被称为“传统型庙会”;一是以经济交流为主导功能的庙会,被称为“商业型庙会”。应该说传统型庙会在近代前一直占据优势地位。近代以后,神灵信仰在庙会中的地位日益衰落,传统型庙会即逐渐让位于商业型庙会。因此,传统型庙会发展缓慢,而商业型庙会则得以迅速发展。

其次,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在整个山东神灵信仰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庙会神灵信仰事实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公众信仰,由此可凝聚对神灵的信仰力,扩大神灵信仰的受众和范围。从整体上来看,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的衰落使近代山东神灵信仰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公共发展平台,从而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众信仰的根基。

最后,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的历史变迁虽受外在因素的影响,起到加速或减速的作用,但这不是影响其兴衰的决定性力量。只有深植于民众的思想观念和心理需求才是其内在的决定性力量,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因此,近代山东庙会之神灵信仰总体呈衰落趋势,绝不意味着会很快消亡,反而有时局部会出现神灵信仰复萌的现象。

注:①资料源于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之《山东庙会调查集序》。

②关于碧霞元君的生日有正月十五、三月十五、四月初八、四月十八日四种说法,其中以后两种说法最常见。

参考文献:

- [1] 张玉法.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山东省[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 [2] 内务部请大总统查禁赌博陋习及禁售各种赌具呈[A],南京临时政府编辑. 临时政府公报(31)[C],台湾: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
- [3]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Z].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 [4] 吕伟俊. 民国山东史[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 [5] 丁世良,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Z].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Z]. 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7] 凤凰出版社选编.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民国潍县志稿[Z].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8] 王文宝. 中国民俗学史[M]. 成都:巴蜀书社,1995.
- [9] 李泉,王云. 山东运河文化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2006.
- [10] 凤凰出版社选编.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民国临清县志[Z],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11] 山曼,李万鹏等. 山东民俗[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8.
- [12] 《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 民国山东通志(第四册)[M]. 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
- [13] 党明德. 山东近代庙会奉祀神主考略[J]. 民俗研究,1997,(4).

Study on the Spirit Belief of Temple Fairs in Modern Shandong Province (1840-1937)

Wang Fa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common feature that the spirit belief of temple fairs in modern Shandong declined on whole has been reflected, regardless of the evolution tendency, the dedication to the gods, the distribution of believers or the belief orientation. The feature that the spirit belief in modern Shandong has declined, not only slowed dow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in modern Shandong, but also weakened the roots of public faith on the whole spirit belief in modern Shandong. It was an inevitable result that the temple fairs in modern Shandong modernized itself.

Key words: temple fair; the spirit belief; superstition; modernization